

釐清兩制關係 還原一國本質

□茹志俊



中共十八大雖然已結束，但當中所體現的中共治國理政新思路，值得各方認真思考研究。對於香港市民來說，胡錦濤在工作報告中有關香港問題的闡述，不僅體現了與以往不同的表述，更反映了中共對香港問題的深層憂慮。香港各界需要深思的是，應如何正確理解中央對港方針政策的「根本宗旨」，以及處理好「一國兩制」下的「三種關係」。而當中最中之重在於，如何將堅持一國原則和尊重兩制差異這層關係有機結合，不致因有所偏廢，而損害香港的發展前景。

「一國」原則遭忽視 中央憂慮

十八大工作報告中涉及港澳的內容，實際上是自十六大以來最多的一次。在長達四百多字的篇幅裡，廣受關注的內容是：中央政府對香港實行的各項方針政策，根本宗旨是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準確貫徹「一國

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針，必須把堅持一國原則和尊重兩制差異、維護中央權力和保障特區高度自治權、發揮祖國內地堅強後盾作用和提高港澳自身競爭力有機結合起來，任何時候都不能偏廢。

這就是會後被稱作中央對香港工作的「一個根本宗旨」與「三種關係」。儘管香港社會對此有各種不同的解讀，但大多輿論都認為，強調「根本宗旨」與「三種關係」，體現了中央對香港問題的高度關注，甚至是深深的憂慮。這種憂慮在於，「一國兩制」的憲政關係無法在香港社會中形成廣泛而有效的統一認識，並導致所謂的「分離思想」與抗拒「一國」意識的出現。

要準確把握中共在十八大中體現的對港工作思路，必須要明白中央對香港當前問題的憂慮。而說到底，香港問題的根源在於「堅持一國原則」與「尊重兩制差異」之間的矛盾。而國家領導人過去歷次談及香港事務時，也始終將如何妥善處理此種關係視作第一大要務。

在香港，有人認為內地制度不是民主制度，自己無法認同，認為世界上只有「一國一制」，香港不可能跟隨內地的一套；有人認為「一國兩制」至

多只能是經濟上強調一國，政治上必須強調「兩制」；更有人認為「一國」是一個需要重新構建的國家，不是已經有的國家；甚至還有人認為如果不能改變內地的制度，那麼「香港」離家出走也未嘗不可；直到最近一、兩年，有人更公然抬出所謂的「城邦論」、「獨立論」，試圖將香港變成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

顯然，這些觀點看法的出現，皆源於對「一國兩制」的錯誤理解。「一國兩制」方針的基本含義，就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主體堅持實行社會主義制度，香港回歸祖國後設立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的特別行政區，繼續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依照香港特區基本法實行高度自治。無論遇到什麼情況，都要全面準確地貫徹執行這一方針。

「兩制」差異被放大 影響穩定

二零零七年，國家主席胡錦濤出席香港回歸十周年慶典時指出的，「一國兩制」是完整概念。「一國」是「兩制」的前提，沒有「一國」就沒有「兩制」。「一國」和「兩制」，不能相互割裂，更不能相互對立。「一國」就是要維護中央依法享



突然發難

黃牛

打它個十年反腐殲滅戰

□陳群

十八大疾呼腐敗關乎「亡黨亡國」，習近平「就職演說」提出：「全黨必須警醒起來」，「打鐵還需自身硬」，又在政治局第一次學習時指出：「物必先腐，而後蟲生」，「我們要警醒啊」！王岐山在中紀委常委第一次會議上更直言「深入推進反腐鬥爭」。清晰表明中共已把反腐提到空前高度，將加大反腐力度。



陳群

中共十八大發出一個強烈信號，將加大反腐力度，進一步從嚴治黨，以順應國祚民意。胡錦濤十八大報告警告全黨：反腐「是人民關注的重大政治問題。這個問題解決不好，就會對黨造成致命傷害，甚至亡黨亡國。」

習近平就職演說提出：「全黨必須警醒起來」，「打鐵還需自身硬」，又在政治局第一次學習時指出：「物必先腐，而後蟲生」，「我們要警醒啊」！王岐山在中紀委常委第一次會議上更直言「深入推進反腐鬥爭」。從致命傷害、亡黨亡國、必須警醒到反腐鬥爭，清晰表明中共已把反腐提到空前高度，將加大反腐力度。

關乎亡黨亡國

過去十年，中國輝煌成就與腐敗並存，經濟增長與腐敗齊頭並進，「如日月之行，人皆見之」。腐敗擴散成執政最大羈絆與威脅。十八大報告告誡全黨必須「自我淨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把「抓好道德建設」作為一切工作的「基礎」，突出強調「踐行社會主義榮辱觀，做社會主義道德的示範者、誠信風尚的引領者、公平正義的維護者，以實際行動彰顯共產黨人的大德大德」。特別指出反腐問題解決不好，「甚至亡黨亡國」。

筆者以為，腐敗雖成尾大不掉之勢，但尾大不等於割不掉，關鍵在於決心、果敢與手段。決心不在嘴上而在手上，割腐不用話語而用

刀子。據公開報道統計，僅2010年被判處的省級官員達12人，既有央企高管（如國開行副行長王益、中核集團總經理康日新），又有黨政領導（如福建省委秘書長陳少勇、浙江省副書記王華元）；既有政法高官（如最高法院副院長黃松有、公安部部長助理鄭少東），又有人大、政協要員（如貴州政協主席黃瑤、全國人大預算委主任朱志剛）。誠然，階級鬥爭為綱與經濟建設為中心在腐敗條件上有區別，前者「與人鬥，其樂無窮」，後者「與錢鬥，其貪無比」，社會土壤完全不同。十八大疾呼腐敗關乎「亡黨亡國」，足見中共已深悟「腐之膏肓，禍亡國黨」。

打鐵需自身硬

習近平總書記「就職講說」受到全球高度評價，其中「反腐聲音」猶受關注。他說「打鐵還需自身硬」。我們的責任就是「堅持黨要管黨、從嚴治黨」。近日他又在政治局第一次學習會上指出：「物必先腐，而後蟲生」。頗具前輩遺風，善用中國古話發出「警醒恆言」。就像毛澤東「流水不腐，戶樞不蠹」，就像鄧小平「不管黑貓白貓，逮住耗子就是好貓」。他剛主政就提出「打鐵論」與「腐蟲論」，與當今中國開口「洋腔洋調」，閉口「西經西典」的過度崇洋之風形成強烈反差，講出了「中國話」，透出了「中國味」。筆者並非反對學習西方先進東西，只是反對一些人對洋腔洋調、西經西典迷信過度，毫無顧忌。

「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出於蘇軾《范增論》，意思是東西一定是自己先腐爛，蛀蟲才能生出來。更早出於《荀子勸學》「肉腐出蟲，魚枯生蠹。」都是說物腐、肉腐、魚枯都必生蟲生蠹，結果或「怠慢忘身」或「禍災乃作」。這不正是當日貪官書生的動盪寫照麼？李商隱《詠史》曰：「歷覽前賢國與家，成由勤儉破由奢。」講歷代聖賢治國治家經驗

有的權力，維護國家主權、統一、安全。「兩制」就是要保障香港特區依法享有的高度自治權，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區依法施政。只有把以上兩個方面都落到實處，「一國兩制」的優越性才能充分發揮出來，給香港同胞帶來實實在在的福祉。

香港市民享有高度自治，保持原有生活方式不變，這絕不能以犧牲「一國」為代價。如果有人認為只有強調「兩制」、極力淡化「一國」才是香港的「長遠出路」，這無疑是極其錯誤而危險的。如果說當前香港所遇的種種「兩地矛盾」問題，是源於對「一國兩制」的錯誤理解，那麼要令香港獲得長遠的繁榮穩定、健康發展，就只能在確保「一國兩制」方針獲得正確貫徹中實現。

當然，從另一個角度，過分強調「一國」而忽視「兩制」差異，也並不是正確的做法。香港擁有自身的歷史地域因素形成的特徵，這正是香港保持活力與高度競爭力的原因，如果「兩制」特色消失，香港也將無法成爲一個獨特而令人嚮往的城市。但相比之下，當前更大的問題還在於，模糊「一國」強化「兩制」不斷成爲一種政治抗爭方向，甚至成爲影響內地的藉口。如此發展趨勢，焉能令中央放心？

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必須把堅持一國原則和尊重兩制差異、維護中央權力和保障特區高度自治權、發揮祖國內地堅強後盾作用和提高港澳自身競爭力有機結合起來，任何時候都不能偏廢。十八大報告的這番闡述，實際上是爲未來「一國兩制」的落實，指出一種制度平衡的可操作方式，有利於香港的長期發展利益，值得香港各界認真分析研究。

，成功皆因勤儉，敗亡皆因奢侈。這不正是當今貪腐致亡的切膚痛麼？習近平三天之內兩次提到「警醒」，三天之內提出「兩論」，令百姓對新班子的反腐決心刮目相看，信心亦增。

反腐是場鬥爭

近日王岐山主持中紀委常委會第一次會議時不僅表示空前反腐決心，而且把反腐提到「鬥爭」高度。他說，要「堅定不移把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鬥爭引向深入」；要「下決心改進文風會風，着力整治庸懶散奢等不良風氣，認真糾正損害群眾利益的不正之風」；要「努力實現幹部清正、政治清廉、政治清明的目標要求」。作爲黨內經濟、金融專家的王岐山出任中紀委書記，多少有些出人意料。但想到這位與習近平一起被美國評爲的「最有世界影響力百名人物」，執掌中紀委未必不是上選。第一代領導集體犯過重錯，但在「爲政清廉」及與百姓「同甘共苦」上，堪稱一代楷模。無論作爲總書記的習近平，還是作爲中紀委書記的王岐山，在繼承前輩「夙夜在公」、「清正廉潔」和反對「庸懶散奢」等爲人處事上，或可期待颯起一陣廉政新風。

筆者以為，腐敗是當前任何國家、制度都不能根除的現象。十八大報告指出「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脫離群眾、消極腐敗」四大危險，習近平就職演說指出「貪污腐敗、脫離群眾、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四大問題，都說明反腐（包括文風會風、庸懶散奢等政治腐敗）積重難返，任重道遠。但只要能下大決心，肯花大氣力，敢出殺手鐮，踐行十八大報告「不管涉及什麼人，不論權力大小、職位高低，只要觸犯黨紀國法，都要嚴懲不貸」，打它個十年貪腐殲滅戰，把反腐敗做到百姓滿意的程度，就算政改圓滿、功德無量了。

作者爲資深評論員

中美關係需以智慧求穩定

蘇虹何溢誠



中國的迅速崛起，似乎讓曾經一度世界獨大的美國有了寢食難安的感覺，就連奧巴馬與羅姆尼的三場辯論中，雙方竟53次提及中國。由於「反恐」戰爭取得初步勝利後，美國開始騰出手來「重返」亞洲，並對中國採取一系列遏制政策，中美關係由此也步入一個非常奧妙的歷史時刻。在習近平繼任、奧巴馬連任之後，從此將更加需要中美兩國領導人智慧地在動態中尋求中美關係的穩定。

「蜜月期」總是很短暫

第二次世界大戰特別是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在面臨法西斯主義這個共同敵人的背景下，美國「慷慨」地通過了《租借法》，在1941年到1945年期間向中國提供了13億多美元的資助，支持中國的抗日戰爭。羅斯福總統在演說中講道：「千千萬萬的普通中國人民，在抗拒中國被敵人宰割中顯示出同樣偉大堅強的意志……中國毫無疑問地將得到我們的幫助。」對此，毛澤東在1944年致羅斯福的信中也熱情洋溢地表示：「我們中國人民和美國人民一向是有歷史傳統的深厚友誼的。我深願經過您的努力與成功，使得中美兩大民族在擊敗日寇、重建世界的永久和平以及建立民主中國的事業上永遠攜手前進。」

然而，美國的對華友好並不是無條件的。出於對共產主義的懼怕和對「紅色中國」的誤解又使得在長達20多年的時間裡，美國無所不用其極地遏制、孤立和封鎖中國。冷戰之後，由於中國自身綜合國力與國際地位的上升，以及兩國對各自國家安全的考慮，才使中美聯手共同抗衡蘇聯成爲「大勢所趨」。美國總統尼克松最終認識到，「在這個小小的地球上，已經沒有地方能容納下10億潛在的最能幹的人民生活在孤獨的憤怒之中。」中國也在相當濃厚的意識形態背景下與作「宿敵」的美國接近和交往。

由於目前中美關係處於諸多領域全面競爭、而不是全面對抗的態勢，因而美對華政策呈現「陰陽不定」的特點，其直接後果便是美國對中國長期採取「模糊戰略」。在冷戰時期，美國對付蘇聯有明確的政策，即全面遏制和戰略競爭。然而，在相當長的時間裡，美國還很難制定出如同冷戰時對蘇政策那樣清晰的對華政策。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經濟全球化和區域化以及中美兩國間的相互依存因素在日益增加。如果說相互孤立是冷戰時期美蘇兩大集團的結構性因素，那麼相互依存則是今天中美關係的一個基本結構。儘管這個結構處於變動之中，但也呈現出相對穩定的趨勢。中美雙方要回到相互孤立的結構，都會付出巨大無比的政治和經濟代價。也就是說，美國對中國的過度強硬也將損害美國自身的國家利益。當然，這也適用於中國的美政策。

相互依存的博弈關係

美國對華政策表現出相當大的不穩定性，可以從兩個層面上看待這個問題：首先是這個結構本身處於變動狀態，變化自然產生不確定性。其次，這個結構意味着中美雙方的接觸越來越廣。接觸越多，摩擦也自然增加，這也表現在中美兩國和其他國家的關係上。美國對華政策的不確定性，意味着中國會受到來自美國的非常大的壓力。正是由於相互依存，美國擁有更多的機制和手段來影響中國和對華施壓。

中國面臨的挑戰是如何應付美國對華政策的不確定性。中美兩國的相互依存狀態一方面決定了兩國的關係是一個相互影響、相互轉型的過程，另一方面也促使兩國直面對方的不確定性。兩國之間，很難制定出「一攬子」對華或對美政策。特別是，當前以美國爲首的一些西方國家在人權、貿易、「中國製造」、國家安全等諸多領域對中國大發「骯水」。對此，我們可以選擇「以牙還牙」的處理方法，尤其是那些事關中國核心利益問題。但是，處理國與國之間的關係不能以「解氣」「解恨」爲最終目的，而要採取「有理、有利、有節」的鬥爭策略，用足夠的耐心和加倍的理性來看待中美關係面臨的矛盾和困難。同時，中國對美政策需要在「不確定」的大框架下，動態中尋求相對穩定的政策，以求得相對穩定的中美關係。這需要決策者和政策制定者們，能站在歷史的高度，以更加平和的心態、更加豁達的胸襟、更加靈活的方法來面對和處理中美之間不可避免地出現的各種矛盾。

（蘇虹，博士；何溢誠，復旦大學台籍博士生，國民黨中央委員）

解決南海問題的戰略選擇

□鄭海麟



鄭海麟

針對美日等國大力介入南海事務和島嶼爭議問題日趨緊張的局面，有學者建議中國當局應改變思路，分層次地對待南海紛爭。即對於涉及領土主權歸屬的問題應該堅持雙邊談判原則，反對外來勢力干預和國際化趨勢；對於涉及南海地區公共安全的議題，如海洋環境保護、反恐、打擊海盜等問題，應積極考慮地區合作的可行性，利用現有的地區合作機制發出自己的倡議。此外，中國還可以考慮提議由中國和東盟共同建立有關討論南海非傳統安全或公共安全問題的論壇，等等。

外交戰線 兩手準備

然而，究竟應該如何分層次地對待南海島嶼爭議問題？筆者認爲，中國在外交上需「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做兩手準備。同時需進一步改善與周邊國家的關係，堅持在維護「主權在我」的前提下討論「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問題。爲此，筆者認同某些學者的論點，即當前中國的南海政策應當首先破解將東盟作爲一個整體與中國談判南海問題的困局。首先與權益爭議較小的印尼完成海疆劃界，通過合作或者適度的讓步與文萊等小國達成諒解，集中力量解決與越南的島嶼爭議糾紛，中國必須充分認識到在南海諸多島嶼爭議中，

與越南的糾紛是南海問題的焦點或曰主要矛盾。在這一主要矛盾短時期無法解決的條件下，中國可在已被越南開發的其他爭議島嶼或區域重新設定開發項目，以「先開發、後合作」的方式推動「共同開發」，爭取與越南共謀南海問題的和平解決，必要時還必須作好「亮劍」的準備。也即是「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攻」。

據《漢書·地理志》記載，早在秦漢時期，中國先民便從廣東的徐聞、合浦（今屬廣西）港口出發，前往南海活動，進行開發，南海諸島中的許多島嶼最早就是由中國先民發現、命名和開發的。至於中國與東南亞各國的關係，據李長傳《南洋華僑史》稱，早在唐代以前，就有華人在南洋一帶開闢關土，休養生息。當地人稱他們爲「唐人」，可見華人移植南洋，至遲爲始於唐代。宋人周去非的《嶺外代答》、趙汝適的《諸番志》、元人汪大淵的《島夷志略》，明代周達觀的《真臘風土記》、嚴從簡的《殊域周咨錄》等著作，對唐宋元明以來中國與東南亞各國的關係都有記述。及至鄭和下西洋時，華人在東南亞的勢力已甚盛。

德威並施 以法止爭

根據以上史料記載，南海諸島在唐代就已被列入中國版圖，即「悉歸華方」。明代也將南海諸島納入行政管轄，鄭和七下西洋，其中一項任務就是巡視南海，也就是今天國際法意義上的宣示主權。南海諸島中的許多島嶼就是由鄭和及其隨員首先發現、命名和開發的。至於明代與東南亞各國之間（包括東亞的朝鮮和琉球），則建立起一種前所未有的朝貢貿易體系和宗藩關係。

由於宋朝的對外政策因過分強調「德」（王道）而忽略「威」（武力），不單止北方不斷遭受外族侵入，對東南亞海域亦無力控制。南宋時期高宗試圖與高棉帝國、爪哇等東南亞國家建立關係，但沒有得到他們的積極回應。元朝建立後，其外交政策一改前朝，過分強調「威」而不重視「德」。特別是忽必烈統治中國後，屢屢耀武海外，要求東南亞各國「臣服」。這種單邊政策遭到東南亞各國拒絕，又頻頻對安南、占城、日本和爪哇用兵，但最後皆以失敗告終，南海諸島自然也不在元朝掌握之中。明代吸收了宋朝只重「德」不重「威」和元朝只重「威」而不重「德」的失敗教訓，採取「德」與「威」並重的對外政策，獲得了東南亞各國甚至整個亞洲絕大多數國家的認同。及至永樂帝派遣鄭和率龐大艦隊七下西洋，憑藉優越的文明和超強的實力，對東南亞各國採取「恩威並施、王霸雜用」的方針，將東南亞大小三十多個國家納入朝貢體系。正是因爲這些國家不但認同而且仰慕中華文明的價值體系，所以紛紛投入中華文明的大家庭，甚至將其國的山川河流一併納入中國版圖，與中國一同享受祭祀（例如，安南、占城、柬埔寨、暹羅等國納入慶祀，三佛齊、爪哇納入廣東，琉球、渤泥則納入福建）。

對於明代的這一歷史經驗，筆者認爲有必要作深入剖析和認真總結。當中國和平崛起之後，在展示「權威與實力」（即所謂「綜合國力」）的同時，「有必要強調堅持以國際法來處理對外事務和南海紛爭。只有將傳統中華文明中的「德」與「威」放在現代國際關係的框架內，才有可能使中華民族的元氣復蘇。

作者爲香港亞太研究中心主任